

容闳——中国留美第一人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千千万万莘莘学子,赴欧美等国留学,以寻求改造社会、富民强国之路。有人统计,一百多年来,我国外出留学人员达一百多万人。他们大多学成归来,报效祖国。容闳就是早期留学人员的代表。他1847年元月赴美,1854年夏毕业于耶鲁大学,是中国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人。不仅如此,他还首倡、筹划并促成清政府派遣幼童出洋留美计划。虽中途夭折,但仍不失为一次惊世骇俗的有益行动。一些中美史专家认为,容闳1872年的这次壮举,是中美交往史上的第一次。说来也巧,整整一百年以后,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签署上海公报,中美关系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容闳也就成为中美交往史的开拓者。

1828年,容闳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南屏镇的一个农民家庭。这时的广东沿海地区,已有许多外国商船往返于欧美,也有许多外国人在此经商、传教、兴办实业。他们雇用大批当地华人,使这些人的收入高于当地其他居民。因此,大家都愿意把孩子送入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读书。容闳因此得时代风气之先,捷足先登地接受西方文化教育。

容闳七岁时,被父亲送入当时由英国传教士郭士力开设的专收贫寒子弟的一所西塾学堂,学堂位于与南屏镇仅一水相隔的澳门。四年后学校停办,他过了几年流浪生活,贩卖糖果、割稻拾穗、在澳门一家天主教印刷厂当学徒工等。十三岁时,又进入美国人塞缪尔·布朗办的

马礼逊学堂读书。学校开设英语、算术、史地、音乐等中西课程。他在此读了近六年的书，对校长布朗的为人品行十分崇拜和敬仰。因此，当1846年布朗因身体有病欲回美国，临行前表示要带几个中国学生去美国学习现代科学知识时，容闳首先报名愿意前往。1847年元月，他和同班的黄宽、黄胜一起，漂洋过海，开始了异邦求学的生涯。

到美国后，容闳先在马萨诸塞州的孟松中学读预科。该校德高望重的校长海门先生是当时美国东部几个州有名的教育家。他对三名中国学生的关心和新颖的教学方法，给容闳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容闳感到美国教育的特点是既重智育又重德育，这就是他后来带领中国幼童赴美求学的最初动机。1849年，容闳以优异成绩毕业，决定报考美国著名学府耶鲁大学。这时上学的经费发生了困难。

当初，他们赴美读书的经费由香港教会提供，年限仅为两年。到美国后，黄胜由于生病，不满一年就回国了，黄宽也于两年后去了英国求学。按照孟松学校的规定，如果学生在大学毕业后愿意担任传教士，学校可以资助，但必须先填好志愿书。容闳谢绝了。他认为，自己虽贫困，但必须保持自由，以后读完书，无论从事哪种工作，必须选择最有益于中国的事才干。如果仅仅限于某个职业，则太窄，不能发挥自己的特长和才能。最后，还是布朗先生想法争得佐治亚州萨凡纳妇女会的资助。容闳不胜雀跃，连忙打点行装赴纽黑文直奔耶鲁大学投考，果然不负重望，一考即中。在校期间，对比中西方社会现实的强烈反差，痛感祖国的落后和黑暗，同时也意识到了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这时，他就萌生了一个念头，希望有更多的中国青少年能像自己一样出国留学，使自己的祖国得以富强起来。

1854年，他从耶鲁大学获得学士学位，成为近代中国留学美国的第一个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他流利的英语和身后



的大辫子令前来观看的美国人感到惊讶！之后，他毅然放弃在美继续深造并可获优越生活待遇的机会，抱着“以冀平生所学，得以见诸实用”的心愿，义无反顾地回到了中国。

容闳虽报国有志，却请缨无门。他虽持有美国名牌大学的文凭，但回到仍崇尚科举制度的中国，却得不到承认和重用。自1855年起的最初几年里，他不得不先解决衣食之虞。凭借自己在英文上的优势，他先后在广州、香港和上海等地任文书，当翻译，在洋行里任职员，帮人经商。人世谋生，屡迁其业，徒为衣食奔走的容闳几乎一筹莫展。在此期间，他对中国社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感觉到中国确实地大物博，人民勤劳勇敢，只是教育落后，思想陈旧，致使民不聊生。而清政府软弱无能，任凭外国列强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这就更加增强了他改造社会的意识。同时，他又结识了一批立志改革的有识之士，为他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提供了一些条件，也影响了他人的人生历程。

他首先把目光投向了太平天国。时任干王、总理朝政的洪仁玕是他在香港结识的好友。当他向洪仁玕提出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府为核心、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七项改革建议后，洪虽表示赞成，封他一个“义”字的空头官阶，却再无下文。他对太平天国失望了，只得离开。

不得已，容闳又做起了茶叶商。当他了解到沿海地区茶叶紧俏而内地却有大批茶叶待运，别人都因路途艰难不敢贸然行动时，容闳决定冒这个险，不想一举成功，赚了一大笔钱。正在这时，他收到了曾国藩招他去安庆面谈的信件。容闳感到意外，莫非自己的天京之行引起了曾国藩的怀疑？后经证实，原来是曾的幕僚张斯桂和容闳在上海结识的好友数学家李善宝的推荐。当他向正在安庆办军械所的曾氏建议“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就是以基础工厂为主，由此造出种种分厂，再由此制造各种特别机械的建议时，受到曾的赏识。这正好

是他的专长。容闳在耶鲁大学读的就是机械制造。没几天,即授予容闳五品军功的官衔,任命为出洋委员,并拨专款六万八千两银子,派他赴美采购机器。经过一番辛劳,容闳购回了机器,江南制造局在上海开业了。1865年10月,容闳被授予五品候补同知官衔。在此期间,他有幸结识了协助曾国藩办理洋务同时兼任江南制造局总办的上海道丁日昌,两人成为莫逆之交。也正是丁日昌将他的派遣幼童出洋留学计划经曾国藩等大臣同意上报朝廷,得到了清王朝的批准。丁日昌连夜来告,容闳兴奋得一夜没有合眼。用他的话说“予闻此消息,乃喜而不寐,竟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而凌云步虚,忘其为僵卧床第间”。

容闳的计划说:

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一百二十名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以十二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二批学生出洋留学,卓有成效,即以后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并须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

1870年冬,第一批三十名幼童先在上海设立的预备学校补习汉文和英文后,于1872年夏末,踏上赴美留学的征程。此时,受命担任留美学生事务所副监督的容闳,已先期赴美。

容闳先到斯不林菲尔,找了一个适宜的地方,作为中国留学事务所的办事处,安排学生住宿和上学。后来觉得此地太小,不是政治文化中心,又把办事处迁到康涅狄格州府所在地哈德福特。容闳还得到清政府批准,在此监造了一幢坚固壮观的建筑,作为留学事务所永久的办公地点,以求其在美国根深蒂固,



希望将来中国政府不致轻易变卦造成取消此事。1875年,已是第四批学生来美留学,也是三十名。此时,清政府任命容闳为驻美公使。他怕离开留美学生事务处而使此事半途而废,遂申请继续留任,得到批准,任命他为驻美副公使兼留美学生事务所监督,使他在留学生方面仍有权调度一切。

但好景不长,容闳的良苦用心终成泡影。1876年,事务所又来了一个吴子登。他本是洋务派的反对者,对中国学生留学外洋,向来视为离经叛道之举。又因以前与曾国藩、丁日昌不和,不遗余力地破坏。先是在曾的继任者李鸿章(此时曾已死)前造谣生事诋毁容闳,后终找个借口要求解散留美学生事务所。李鸿章也不愿支援学生,命令撤回留学生。这一百二十名学了一半的中国留学生只得于1881年全部凄然回国。容闳试图借助某些当朝权贵实现留学计划的苦心,最终还是半途而废了。爱国诗人黄遵宪听到这件事后,在《罢留美学生感赋》中写下这样饱含忧愤的诗句:

郎当一百人,
一一悉遣归;
竟为瓜蔓抄,
牵连何累累。

此后,容闳只身去了美国,也在事实上退出了洋务运动历史舞台。但他仍关心着祖国的命运。他在中日甲午战争、康梁变法等运动中都积极参与,终于在垂暮之年,实现了由维新向革命的重大思想转变。1900年秋,容闳与孙中山在船上巧遇相识,两人一路纵论天下大事,可谓志趣相投,相见恨晚。晚年的容闳,积极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容闳立即致电庆贺。刚刚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

山随即向远在美国的容闳发出邀请函,请他回国共商建国大计。可惜他年事已高,终于未能返回故土。1912年4月21日,容闳走完了他艰难坎坷的人生旅途,终年八十四岁。

容闳的幼童留学计划虽然夭折,但仍不失为一大创举。清亡后,有人统计,他带出去的一百二十人中,许多人都学有所成。他们中从事政治外交工作的二十四人,其中有民初总理唐绍仪,外交总长梁敦彦等。从事海军工作的二十人,其中有海军舰队司令吴应科,有七人在甲午、甲申两次海战中为国捐躯。还有人从事铁路、电报、矿业、教育等工作。而后来成为中国铁路先驱的中国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此举也激励了更多中华优秀儿女出国留学,报效祖国。容闳晚年著有《西学东渐记》,记述他一生的事迹。